

“本体安全”与波兰右翼政府的 疑欧主义

——以欧洲难民危机为例*

王弘毅

【内容提要】 自2015年右翼政党—法律与公正党执政以来，波兰政局和社会加速右转，疑欧主义声势愈演愈烈。尤其在欧洲难民安置这一议题上，波欧之间围绕主权、安全和身份认同等议题展开了激烈的叙事之争，对欧盟内部团结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冲击。既有研究主要从“经济—社会”和“文化—社会”因素两个角度分析了波兰右翼政府疑欧主义政策的缘由，缺乏将两者相结合的综合性及理论升华。基于此，本文尝试从本体安全理论出发，将“基督教民主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三种相互交织但又彼此独立的意识形态进行有机融合，作为解释波兰疑欧主义的核心因素，提出一个更加全面和系统的理论框架，即“本体安全”的威胁感知程度是塑造波兰右翼政府疑欧主义思想强弱变化的根本驱动力。为了检验这一理论，本文以2015年以来的欧洲难民危机为案例，重点分析了难民危机与波兰右翼政府的本体安全叙事建构，以及右翼政府如何调动本体安全叙事进行政治动员，进而使其对于欧盟难民政策的反抗合法化。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评估了波兰右翼政府疑欧主义政策在波兰国内和波欧关系两个层面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对这一案例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波兰疑欧主义的根源和波欧之间分歧的本质，并对欧洲一体化的未来作出深刻反思。

【关键词】 波兰 法律与公正党 疑欧主义 难民危机 本体安全

【作者简介】 王弘毅，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中东欧研究中心讲师。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百年变局下中东欧国家的外交选择及中国应对研究”（项目号：22CGJ031）的阶段性成果。

引言

“疑欧主义”^①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对欧盟的合法性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整个欧盟内部，波兰的疑欧主义程度仅次于前欧盟成员国英国。一个显著的证据是2021年10月，波兰宪法法院宣布其国内法优先于欧盟法律，此举在欧盟和波兰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波兰脱欧”（Polexit）问题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波欧关系龃龉不断且分歧不断扩大的起点是2015年，即右翼政党法律与公正党对内推行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社会福利政策，对外秉持民族主义政策，将“捍卫民族身份、保卫国家安全、促进社会公平”等作为执政纲领的核心价值观。波兰作为中东欧首批加入欧盟的新成员国，一直以来不仅是欧盟凝聚力基金的净受款国，而且通过融入欧盟单一市场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参考英国脱欧的经济逻辑，波兰右翼政府不断扩大的疑欧主义声势不符合常理。但值得深思的是，作为一个欧盟成员国中的经济和政治获利者，2015年以来的波兰缘何成为当前欧盟内部疑欧主义情绪最强烈的国家？波兰疑欧主义的独特性体现在哪里，根源又是什么？考察上述问题，不仅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波兰疑欧主义问题的本质，亦可以洞悉波兰疑欧主义的限度以及波欧关系的未来趋向。而波欧关系趋向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欧盟内部的团结以及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发展方向。

① “疑欧主义”（Euroscepticism）泛指对欧盟和欧洲一体化的批评。疑欧主义认为一体化会破坏国家主权和民族国家，认为欧盟是精英主义的，缺乏民主合法性和透明度，认为它过于官僚化，过于浪费，鼓励高水平的移民，是一个以牺牲工人阶级为代价为商业精英服务的新自由主义组织。在概念层面，民粹主义和疑欧主义既密切相关又有着内在的区别。值得注意的是，民粹主义是一套关于民主运作的一般观念，而疑欧主义则关注更具体的政治问题（欧洲一体化）。在实践中，许多民粹主义政党是疑欧主义者，许多疑欧主义政党是民粹主义政党。

② 如孔田平：《“脱欧”在波兰成为热门话题》，载《世界知识》2021年第22期；程卫东：《欧盟宪政秩序的挑战与危机——基于波兰法治危机案的考察》，载《欧洲研究》2022年第1期。国外关于波兰脱欧问题的探讨更是见诸于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德国之声（DW）、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ABC News）等各大主流媒体，以及诸多学术研究之中。譬如：Khmilevska Polina, “Struktura ruchu eurosceptycznego w Polsce – skrajnie prawicowi polityczni i obywatelscy ekstremisci”, *Rocznik Integracji Europejskiej*, nr. 15, 2021, s. 233 – 247; Oliver Mader, “Polexit Hungarexit Quo vadis EU – Some reflexions on the latest solutions provided by EU constitutional law in the face of a persistent rule of law misery”, *Austrian Law Journal*, 2022, Nr. 1; Alicia Hinarejos, “‘Polexit’ from the EU Legal System? The Court of Justice and the Polish Constitutional Court”, *European law review*, 2021, No. 4, pp. 413 – 414; Szczerbiak Aleks, “How will Poland’s dispute with the EU affect its national politics?”, LSE European Politics and Policy (EUROPP) blog. <http://eprints.lse.ac.uk/113067/>, 访问时间：2022年2月15日。

一 文献述评

近年来，疑欧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欧洲研究的热点，作为中东欧地区疑欧主义典型代表之一的波兰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对 2015 年以来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考察，可以发现对波兰疑欧主义的兴起与不断扩大主要有两大类解释。一类立足于“经济—社会”维度，认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欧盟东西间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波兰国内财富分布不均的扩大化导致社会分层的扩大，为具有疑欧主义倾向的右翼民粹主义政权的上台提供了动力。另一类则从“文化—社会”角度揭示了波兰右翼政府疑欧主义的文化根源，即保守的民族主义和天主教文化。

持第一类观点的学者大都将波兰右翼政府的疑欧主义思想根基归因于“民粹主义”。波兰学者兹齐斯瓦夫·马赫搭建了右翼民粹主义与波兰疑欧主义之间复杂关系的分析框架，深刻地揭示了欧盟和波兰、精英和大众之间的疏离感产生的本质，即右翼民粹主义将民族看作一个文化而非政治性的共同体，因而政治精英和欧盟都将被划到他者之列^①。罗伯特·塞希等人通过对比波兰和匈牙利两个案例，阐释了两国民粹主义与疑欧主义立场之间的逻辑关系。以此逻辑，欧盟被等同于与“纯粹的人民”（波兰人）发生冲突的“腐败精英”^②。黄丹琼对民粹主义在中东欧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以及对中东欧国家疑欧主义倾向强化所起到的作用作出了解释^③。彭泉则将重点放在了中东欧国家民粹主义兴起的社会基础上，并着重以保加利亚为案例^④。在这两篇文章中，对波兰疑欧主义问题都一笔带过。当然，两位学者在对中东欧疑欧主义的规律性阐释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但中东欧国家之间异质性甚至要大于同质性，单一案例无法回应中东欧其他国家民粹主义兴起的特殊性及其疑欧主义立场的差异性。

持第二类观点的学者的分析视角集中在波兰的保守主义文化基因上，这种

① Zdzisław Mach, “Right – wing populism, Euroscepticism, and neo – traditionalis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Joanna Sondel – Cedarmas and Francesco Berti, eds., *The Right – Wing Critique of Europe: Nationalist, Sovereignist and Right – Wing Populist Attitudes to the EU*, Routledge, 2022, pp. 22 – 31.

② Robert Csehi and Edit Zgut, “We won’t let Brussels dictate us: Eurosceptic populism in Hungary and Poland”,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2021, Vol. 22, No. 1, pp. 53 – 68.

③ 黄丹琼：《中东欧民粹主义兴起与欧盟内部分化》，载《国际观察》2018 年第 1 期。

④ 彭泉：《中东欧的民粹主义基础及其影响——兼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载《国际展望》2021 年第 1 期；彭泉：《投票行为理论视角下中东欧民粹政党的兴起》，载《国际论坛》2021 年第 3 期。

文化基因是由历史上的苦难与抗争记忆建构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浓厚的天主教信仰。从现有成果看，该类研究的数量明显高于第一类，这恰恰证明了“文化—社会”结构在塑造波兰政治和外交思想方面的独特意义。从民族主义归因来看，波兰学者艾娃·罗基茨卡和英国学者杰里米·利曼将疑欧主义的根源归结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并强调“多元文化、多民族”结构是导致欧洲国家内部民族主义复兴的原因之一。从根源上看，这种民族主义更多地根植于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合流，强化了民众对于未来的不确定和变化的恐惧感。前者导向一种排外主义，后者则是对政治和经济精英的疏离及不信任^①。德国学者以欧洲难民危机和法治争端为研究案例，指出波兰的疑欧主义被右翼政府当作一种政治工具，即通过诉诸民族认同和认同情绪来动员选民^②。

天主教因素是“文化—社会”结构归因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将保守或极端的基督教民主主义视作波兰疑欧主义的动力之一。英国学者西蒙娜·格拉从历史和宗教因素探究了波兰疑欧主义思潮的起源，以及右翼政府与波兰教会的关系，及其在助长疑欧主义和支持严厉的堕胎法方面的作用^③。德国学者米哈尔·明克贝尔格认为波兰兴起的反自由主义和反西方的保守的天主教主义为右翼法律与公正党的崛起创造了社会基础^④。对一些人来说，“欧盟是启蒙运动、人权、自由主义和个人价值的体现”，但对另一些人来说，“欧洲只有当它是天主教，或至少是基督教时才有意义”。波兰人则将世俗欧盟视作是对其传统身份的威胁^⑤。波兰学者巴托什·纳皮拉夫斯基在其著作中考察了政治天主教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性质，讨论了传统上亲欧洲的政治天主教在何种情况下可能变成疑欧主

^① Ewa Rokicka and Jeremy Leaman, *Democracy at Risk. The Growth of Nationalism and Extreme Right Parties as Threat to the EU*, Uniwersytet Łódzki, 2020, pp. 1 – 200.

^② Lucas Benderfeldt, *The Polish Paradox: Euroscepticism as a political instrument, or an integrated part of national identity?*, Student publication for Master's degree of lund University, 2019, pp. 1 – 15.

^③ Simona Guerra,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Euroscepticism in Poland”, in Daniele Pasquinucci and Mark Gilbert eds., *Euroscepticisms: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a political challenge*, Brill, 2020, pp. 190 – 191. Simona Guerra, “The Polish Catholic Church has become intertwined with Euroscepticism and the promotion of conservative ‘national values’”, *Democratic Audit UK*. <http://eprints.lse.ac.uk/80717/>, 访问时间: 2021年12月2日。

^④ 在波兰，激进的右派受到了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严重影响。到20世纪90年代末，玛丽亚电台及其政治代言人—波兰家庭联盟（LPR）接受了战时思想家罗曼·德莫夫斯基的反自由主义和极端天主教的信息。同时，玛丽亚电台将其支持转向了法律和正义党（PiS），该党也吸收了波兰家庭联盟的思想、成员和投票支持。See Michael Minkenberg, *The Radical Right in Eastern Europe*, Palgrave Pivot, 2017, pp. 144 – 145.

^⑤ Natasza Styczyńska, “Eurosceptic parties i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Poland, Hungary and Bulgaria”, in Benjamin Leruth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uroscepticism*, Routledge, 2018, pp. 230 – 240.

义者，并认为波兰的政治天主教是一个特例，带有“天主教—民族主义”性质^①。荷兰学者艾娃·史坦奇克认为自 2005 年法律与公正党首次执政开始，天主教会就被作为重建波兰历史记忆的思想武器之一，且这种重新建构起来的历史记忆被转移到了欧盟的公共政策领域，进而引发了关于欧洲基督教身份的叙事之争^②。

通过以上综述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既有研究通常将“基督教民主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三者之一归为波兰疑欧主义政策的驱动力，但缺乏综合分析，未能将三者呈现出的共性特质上升到理论层面。其二，2015 年以来国内学者对于波兰疑欧主义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存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基于此，本文希望在以上两个方面作出一定的学术贡献，一方面试图从本体安全理论出发，将“基督教民主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三种相互交织又彼此独立的意识形态进行有机融合，作为解释波兰疑欧主义的核心因素，以期能够提出一个更加全面和系统的解释框架；另一方面希望可以弥补国内学界对于波兰国内政治思潮以及波欧关系研究的不足。

二 理论框架

（一）概念界定

“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概念是在广泛借鉴社会心理学的基础上提出的，强调的是一种基于文化认同的身份安全，它的相反面则是本体不安全，即对身份遭受侵蚀的一种无所适从的焦虑，甚至是恐惧感。早在 1933 年，美国心理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就提出了“不安全感”假设（即“本体不安全感”）。在其代表作《世界政治与个体的不安全感》中，拉斯韦尔将不安全感界定为“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或由于剧烈的社会变迁，导致人们丧失对于传统权威或价值的认同，个体被剥夺了人身安全，也没有归属感，这种情况造成了大众的普遍性焦虑”^③。直接对本体安全概念给出定义的代表性学者是

^① Bartosz Napieralski, *Political Catholicism and Euroscepticism: The Deviant Case of Poland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Routledge, 2019, pp. 1–25.

^② Ewa Stańczyk, “Remaking National Identity: Two Contested Monuments in Post-Communist Poland”, *Central Europe*, 2013, Vol. 11, No. 2, pp. 127–142.

^③ [美] 哈罗德·拉斯韦尔：《世界政治与个体的不安全感》，王菲易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 页。

安东尼·吉登斯，其将本体安全定义为“事件的连续性和秩序感”^①，反映的是大多数人对自我认同的连续性以及对周围社会环境的稳定性的信心。换句话说，本体安全的概念通常是指“一种身份安全，即对自己是谁的主观感觉，并成为塑造一个人的行动和选择的主要驱动力”^②。本体不安全感也指“应对不确定性、焦虑和恐惧感增加的特定叙事和话语，并且这种叙事和话语通常与民粹主义政治的后殖民想象相联系”^③。国内学者对此也有一定的研究，余潇枫指出，“本体安全是相对于‘物质性安全’来说的‘认同性安全’，也是任何行为体所必然寻求的安身立命之前提。‘本体不安全’是生存性焦虑与前景性恐慌的‘在场’，由不确定风险的‘要素集合’所导致，其实质是一种‘自我认同’难以稳定与持续的‘结构性不安全’。”^④

从实践角度来看，本体安全理论认为，某些行为是出于寻求维持或重建积极身份的需要。斯蒂尔认为，当代理人（即政府）的行为反映了他们通过传记叙事构建的自我认同感时，本体安全就会出现^⑤。回到波兰的本体安全，民族主义、记忆和安全化身叙事的交叉性使得记忆政治和历史政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历史政治在波兰被理解为一种具有约束力的历史记忆的构建，它通过在特定的叙事结构中组织历史来帮助发展或维持一个突出的群体自我认同^⑥。换句话说，任何对于这种基于民族主义和历史记忆建构起来的身份的侵蚀都将被视为对于波兰本体安全的威胁。

（二）研究假设

本体安全是维系民族国家作为文化共同体区别于他者的身份认同感，是塑造一国对外政策的原始驱动力。正如斯蒂尔《国际关系中的本体安全》一书中所提出的核心假设：国家践行的社会行为是为了满足自我认同（即本体安全）的

① 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Polity Press, 1991, p. 243.

② Jennifer Mitzen, “Anchoring Europe’s civilizing identity: habits, capabilities and ontological securit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06, Vol. 13, No. 2, p. 272.

③ Catarina Kinnvall, “Ontological Insecurities and Postcolonial Imaginaries: The Emotional Appeal of Populism”, *Humanity & Society*, 2018, Vol. 42, No. 4, pp. 523 - 543.

④ 余潇枫：《“和合共生”与“本体安全”》，http://www.cssn.cn/mkszy/mkszy_pyxsd/202209/t20220913_5494554.shtml，访问时间：2021年11月10日。

⑤ Brent J. Steele,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lf-Identity and the IR State*, Routledge, 2008, p. 52.

⑥ Monika Gabriela Bartoszewicz, “Memory as a Security Policy: The Case of Poland”, in Victor Apryshchenko and Oxana Karnaukhova eds., *Memory,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in European Regions*, Information Science Reference, 2019, pp. 50 - 77.

需要，即使这些社会政策会损害实际的物质利益。这种社会行为分别受到“道德、人道主义和荣誉”三种价值的驱动^①。其中，道德强调的是社会和家庭伦理观念；人道主义在国内更多的是一种对于弱势群体的援助，并通过社会改革来改变这一现实；荣誉对于一个民族国家则意味着对于身份的追求和民族复兴的渴望。

对中小国家而言，他们的文化软实力相对有限，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致使民族身份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地受到外来文化冲击，这种冲击带来的危机可称之为“本体安全危机”。以波兰为例，其面临着双重的本体安全危机。其一是波兰在欧盟内部的身份危机，对现任的右翼政府而言，波兰民族区别于他者的根本应该是一个基于共同语言和民族、天主教信仰以及屡遭帝国蹂躏的历史记忆所形成的文化而非政治性的共同体；而以法德为核心所推动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带来的文化多元主义被波兰右翼政府视为对其以单一种族和宗教信仰为文化内核的本体安全的威胁。因此，当右翼政府感知到本体安全遭受威胁时，将坚决予以反击。其政治策略则是通过调动和强化与建构波兰民族身份相关的文化资源进行抗争。这类文化资源主要涵盖了波兰与周边国家（如德国）的历史记忆和保守的天主教信仰。

其二是波兰国内的本体安全危机。准确地说，这是在国内外双重作用下社会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进而产生的身份危机，即横在大众和精英、天主教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拥有国际化视野的波兰人和传统波兰人等多个二元矛盾之上的认同危机。在波兰国内民粹主义者眼里，全球化、欧盟等概念都只是精英创造出来服务于自身利益的代名词。这一观念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分化的扩大化趋势，让普通大众产生了一种相对剥夺感。而所谓的剥夺者包括欧盟、跨国公司和国内精英阶层等，该类群体也因此被大众从认同上归类为区别于“我们”的“他们”，这一文化意义的分类一旦完成，就会建构出彼此不同的社会身份，身份又将决定双方的行为选择。

需要强调的是，波兰国内的本体安全危机是波兰与欧盟之间本体安全危机的加强剂，即国内本体危机越严重，波兰右翼政府对欧盟的反叛情绪越强。而本文的核心假设则是“本体安全”的威胁感知程度是塑造波兰右翼政府疑欧主义思想强弱变化的根本驱动力。与多数欧洲国家不尽相同的是，构成波兰本体安全的

^① Brent J. Steele,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lf-Identity and the IR State*, p. 2.

核心要素不仅囊括了民粹主义，同时还包括了基督教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三者是相互传导、相辅相成的关系，共同建构了波兰右翼政府的本体安全观。

（三）概念操作化

如前所述，本体安全危机是一种身份安全危机，强调区别于他者的民族信仰、民族文化、民族荣誉等身份性要素面临威胁的境况。为了便于衡量本体安全的受威胁程度，本文将其拆解成以下几个衡量维度：宗教保守主义和开放主义的对立程度、精英与人民的对立程度、超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立程度。三个维度分别对应经济全球化及区域一体化背景下民族国家出现的宗教信仰危机、民粹主义危机和民族主义危机。对立程度越高的国家或地区，本体安全受到的威胁程度也越高，即本体安全危机越严重。为了进一步衡量“宗教保守主义和开放主义的对立程度、精英与人民的对立程度、超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立程度”，下文将根据定性研究方法分别对三者的衡量指标进行可操作化处理。

1. 宗教保守主义和开放主义的对立程度

宗教保守主义是指恪守传统且严格的宗教伦理观、宗教仪式及其他与之相关的一切习俗，并用其指导生活实践的方方面面。宗教开放主义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逐渐接受多元化的社会思想，逐步放弃严格的宗教传统伦理，如对 LGBT 持开放态度。为了方便测量，本文主要从定性角度设定衡量指标，即欧盟中新老成员国家在涉及传统家庭和社会伦理议题上（如 LGBT、堕胎问题、媒体自由问题）的对立程度。在当前欧洲基督教世俗化的大背景下，一国宗教信仰群众比例越高，其宗教保守主义势力越大，对建立在传统宗教伦理价值观之上的本体安全感越强烈。以此逻辑，以波兰、匈牙利为代表的秉持宗教保守主义价值观的右翼政府与以法德等为代表的宗教开放主义政府之间的对立程度也就越高。这将导致前者对后者的反叛态度更加强烈，后者常常又被前者看作是欧盟的实际代言人，前者对后者的反叛，实则对于欧盟的反叛。在欧洲，绝大部分的基督教民主政党均为保守主义政党。波兰法律与公正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基督教民主主义通常被认为在文化、社会和道德问题上中间偏右，属于社会保守主义的支持者^①。折射到与欧盟相关的公共政策领域，该类思想往往导向与西欧自由主义价值观相悖的家庭观和伦理观，如反堕胎、反 LGBT 等。

^① Freeden Michael, *Reassessing Political Ideologies: The Durability of Dissent*, Taylor and Francis, 2004, p. 82.

波兰天主教内部主要分为两个阵营：一是规模较小的“开放式天主教”，是波兰进步运动的代表，在历史上曾与世俗左派进行过激烈辩论，是抵制波兰反动天主教的主要力量之一。这一派别的代表人物有前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另一类通常被称为“封闭式天主教”，这一派别规模更大、影响更广，并与法律与公正党有诸多共同点。他们有自己的新闻媒体，并以此作为阵地，广泛传播保守的宗教民族主义思想，甚至播放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节目^①。天主教保守派和开放派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前者在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占主导地位，而后者则在华沙和克拉科夫这样的大城市中占主导地位。年纪较大、文化程度较低和财富较少的人更倾向于投票支持法律与公正党。富人和年轻人倾向支持自由的公民纲领党联盟或左翼联盟^②。总体而言，法律与公正党在经济上吸收了左翼的社会福利政策，在社会生活和文化方面却属于右翼，并将天主教作为其捍卫执政合法性的文化与精神武器。

2. 精英与人民的对立程度

在疑欧主义议题方面，精英和平民则有双重指向。一是欧盟官僚机构内政治精英和欧盟主要大国同相对弱势成员国家之间的对立，原因是欧盟被等同于与“纯粹的人民”发生冲突的“腐败精英”；二是国内社会精英与人民之间的对立。两者发生的场景虽然不同，但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即民粹主义趋向程度越高的成员国通常疑欧主义程度也越高，换句话说成员国对欧盟的反叛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内精英和人民矛盾的转移。两者本质都是两类群体身份的“二元对立”问题，因而也具有身份危机的特质，构成衡量本体安全危机的一个重要标尺。精英与人民的对立程度越高，该国的身份认同一致性程度越低，本体安全受威胁程度自然也就越高。为了便于衡量精英与人民的对立程度，本文将一国民粹主义执政党的支持率高低作为测量指标，可以分为三类：高支持率（超过半数并取得独立组阁权）、中等支持率（支持率排名第一但未过半需要联合其他政党组阁）、低支持率（未取得组阁权）。参考以上指标，民粹主义政党支持率和“精英与人民对立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① Kasia Narkowicz, “Refugees Not Welcome Here: State, Church and Civil Society Responses to the Refugee Crisis in Pol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2018, Vol. 31, p. 362.

^② Julian Coman, “Family, faith, flag: the religious right and the battle for Poland’s soul”,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oct/05/family-faith-flag-catholic-religious-right-battle-polands-soul>, 访问时间：2021年6月9日。

进而也与疑欧主义情绪高低呈正相关关系。

对于右翼政府而言，其主要思想根基之一便是民粹主义，强调的是代表和保护与“精英”^①相对立的“人民”的利益，即自身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言人。这里的人民从文化上象征着整个民族，精英则被划到了民族之外。换句话说，在民粹主义者的眼中，他们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普遍受到少数享有特权的精英群体的压迫。并且，这类精英不仅包括经济融欧主义的支持者，还包括在本国投资赚取巨额利润的外国资本家群体。因此，加入欧盟只是给国内精英群体提供了持续扩大利益的机会，而不是人民。经济差距的不断扩大加剧了人民的这种相对剥夺感，从而为右翼政府的疑欧主义取向创造了充分的社会经济基础。

3. 超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立程度

超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立程度是衡量主权身份危机的一个重要维度。两者对立程度越高，民族主义政府对法德倡导下的欧盟超国家主义趋向愈反对。为了方便测量超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对立程度，本文将欧盟成员国政府对在欧盟超国家层面颁布的统一政策的态度作为衡量指标，如对于难民统一摊派方案的政策趋向。具体而言，可以将其分为四类：坚决拒绝、部分拒绝（象征性接收）、有条件接收、支持。毫无疑问，以上四类态度呈现出的超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对立程度也依次递减，持坚决拒绝态度的成员国，其与欧盟在超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对立程度最高，该类国家的疑欧主义情绪也最高。原因是，对于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而言，主权安全被看作是捍卫其身份安全至关重要的一个支撑。在其看来，民族身份的独立性只有在传统的民族国家内部才能得以体现。该类国家更多支持的是政府间主义下的欧盟，而不是超国家主义式的欧盟，因而坚决反对欧盟的联邦主义趋向。

民族主义强调对与本民族生存、发展与复兴相关的一切地理、经济、文化、宗教和制度等层面的利益予以捍卫的思想观念。例如，当前波兰右翼政府的执政

^① 波兰学者兹齐斯瓦夫·马赫认为精英在民粹主义者的世界观里，指代的是那些自身享有优越感而与人们疏远的群体。他们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享有特权，并对人们加以剥削。See Zdzisław Mach, “Right – wing populism, Euroscepticism, and neo – traditionalis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Joanna Sondel – Cedarmas and Francesco Berti eds., *The Right – Wing Critique of Europe: Nationalist, Sovereignist and Right – Wing Populist Attitudes to the EU*, Routledge, 2022, pp. 22 – 31.

理念深深地植根于波兰的屈辱的“历史记忆”^①，他们格外强调波兰独立的国家主权和民族身份，即使在欧盟中亦是如此。该党所倡导的主权至上原则以及对于其单一种族身份认同的坚持，与欧盟的联邦主义趋向和多元文化主义之间存在着二元矛盾。这种矛盾传导到对欧盟的政策倾向上，主要体现在对来自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的排斥。波兰国内的民族主义政党主要分为两类：右翼民族主义和中右翼民族主义，前者即现任右翼政府，后者则是上任融欧主义政府（2007~2015）。

三 案例检验

保守的基督教民主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三种政治意识形态共同建构起来的波兰右翼政府的“本体安全观”，一旦遭受到外力冲击，对本体安全的保护意识便会被激发，疑欧主义的政策立场也将迅速强化。难民危机之所以能够全方位唤醒波兰对欧盟的抵抗意志，原因在于这场危机同时冲击了波兰右翼政府建构起的经济、道德和政治秩序，也意味着波兰的本体安全遭受到严重挑战。而右翼政府在 2015 年以来发生的席卷全欧的难民危机问题上的本体安全叙事及其反欧盟移民政策的坚定立场，为此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一）难民危机与波兰右翼政府的本体安全叙事建构

1. 将穆斯林难民视为对基督教文明和民族身份的威胁

波兰右翼政府将来自中东、北非地区的穆斯林难民视为对其民族身份和天主教传统文化的威胁。在一个近 90% 的公民宣布自己为天主教徒的国家，教会已经不仅仅是精神信仰的符号，更是一种区别于“他—我”的身份象征，是一种认同的力量。右翼政府执政思想的渊源之一就是“基督教民主”，因而本届政府

^① 历史恩怨导致欧盟国家内部不同政治团体的反欧盟情绪增强。现任右翼政府的执政党党魁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通常被认为是波兰政府权力的实际操控者）的德国（欧盟）观根植于波兰二战中屈辱的抗争历史。卡钦斯基的父母都曾参加了 1944 年的华沙起义，并将这份爱国主义精神传递给了他和他的孪生弟弟莱赫·卡钦斯基。卡钦斯基每晚做完祷告后都会唱国歌。而他的弟弟担任总统期间（2005~2010）对德国、俄罗斯以及欧盟也存在深刻的不信任感。在谈及波兰的抵抗历史，他说波兰感谢欧盟的资金，但不意味着波兰失去了对历史和经济背景发表看法的权利。See Adamowski Jaroslaw, “Lech Kaczynski obituary”,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0/apr/11/lech-kaczynski-obituary> 访问时间：2021 年 10 月 4 日。Nikola Petrovic, “Divided national memories and EU crises: how Eurosceptic parties mobilize historical narratives”,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9, Vol. 32, No. 3, p. 363.

将捍卫基督教文明和波兰身份作为反对欧盟难民安置计划的思想武器。况且，波兰天主教会本身存在开放和传统两种不同的分支。传统派的论调具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对异教徒有着历史和现实的排斥情绪。正因如此，在波兰社会占据主流的传统派天主教会对待难民的消极态度成为右翼政府引导公共舆论、反对接受难民的有力支撑。此外，右翼政府将与教会的合作视为其权威的基石，也是加强波兰身份和天主教之间联系的机会。

在2015年9月进行的一项关于反移民情绪的民意调查中，反对接纳难民的波兰受访者中有44%表示波兰经济状况疲弱，缺乏资源；而41%的受访者提出了与安全有关的原因以及对移民后果的其他担忧。一些观察家还引用了波兰民族身份的宗教元素来解释对接纳北非和中东难民厌恶情绪的不断增强。这些反移民情绪的驱动因素可以归为以下五类：第一，基于个人身份认同受到威胁的文化恐惧。第二，新移民涌入后引起的社会恐惧。第三，对公共资源分配的经济担忧。第四，对政府失去信心而产生的政治恐惧感，以及对超国家机构（欧盟）正在侵蚀国家主权的担忧。第五，对难民带来的犯罪和恐怖主义威胁的担忧^①。

2. 将欧盟委员会通过的难民安置方案视作对其国家主权的侵蚀

右翼政府推动的民粹主义叙事将难民视为入侵者，将欧盟描绘成要把难民强行推到波兰边境的霸主^②。这一矛盾折射的是“超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对立程度的加剧，从而为波兰右翼政府强化基于民族主义的本体安全叙事创造了契机。

该党还将此次难民危机归咎于德国倡导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因此对默克尔奉行的移民开放政策予以指责，认为这一政策可能破坏波兰的文化凝聚力，侵犯波兰的主权。此外，这一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唤起了波兰对德国曾经作为入侵者的历史记忆^③。这种反德的历史叙事部分继承了二战前波兰著名政治家罗曼·德莫夫斯基（Roman Dmowski）的狭义的民族主义假设^④。德莫夫斯基鄙视

^① Jan Cienski, “Why Poland doesn’t want refugees”.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politics-nationalism-and-religion-explain-why-poland-doesnt-want-refugees/>, 访问时间：2021年6月9日。

^② Marcin Kotras, “Dyskurs o imigrantach. Strategie argumentacyjne w polskich tygodnikach opinii”, *Acta Universitatis Lodzianis – Folia Sociologica*, 2016, nr. 59, s. 59–80.

^③ Krzysztof Jaskułowski, *The Everyday Politics of Migration Crisis in Poland Between Nationalism, Fear and Empathy*,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2019, pp. 41–42.

^④ 作为波兰元帅约瑟夫·毕苏斯基的政敌，德莫夫斯基倾向于让波兰成为他所称的“民族国家”，这个国家的国民都应讲波兰语，信奉罗马天主教。如果将毕苏斯基心目中的波兰说成是雅盖隆王朝时期的多民族联邦（海间联邦），那么德莫夫斯基心目中的波兰就是更早期的皮雅斯特王朝时期的波兰，人人皆属一族，共奉一教。

联邦的多民族结构和宗教宽容政策，并将德国视为波兰最主要的威胁。这种反德的民族主义假设，被当前波兰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利用。他们声称，德国曾试图在军事上征服波兰，但没有成功，而现在却试图在经济上支配波兰。因此，波兰极端民族主义者将欧盟视为德国统治和扩张的工具^①。

面对德国方面有关波兰是一个利己的民族，只想从欧盟获得利益，却拒绝履行义务的指责，波兰前外交部长维托尔德·瓦什奇科夫斯基（Witold Waszczykowski）驳斥称：“我们应该提醒他们，我们每从欧盟拿走一欧元，就有 80 美分返回西欧。自波兰 2004 年进入欧盟市场以来，西欧的跨国公司和银行一直在波兰赚取巨额利润。如果是他们把我们和欧盟切断，他们的损失是最大的。值得提醒的是，德国人在多少年后才允许我们进入他们的劳动力市场。”这清晰地揭示了法律与公正党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疑欧主义逻辑，而这一逻辑也为其拒绝承担保护难民的责任提供了基于经济民粹主义叙事的辩护^②。

3. 将穆斯林难民与恐怖主义相联系

在 2015 年的波兰议会选举中，移民接收问题成为右翼法律与公正党与中右翼公民纲领党之间辩论的一个关键议题。从选举结果看，右翼政党成功地主导了社会领域的安全话语，将移民和难民与穆斯林等同起来，认为他们是国家的威胁^③，最终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成为冷战结束以来波兰第一个独立获得组阁权的政党。这一胜利背后也折射出波兰的反穆斯林传统和保守主义的社会文化基调。值得注意的是，2015 年 9 月，即政策制定者对欧盟难民配额计划进行投票的月份，波兰民众对中东难民的接受率达到了 46% 的峰值。而在 2015 年底，这一比例首次下降到了自 1989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为 30%^④。

在欧盟难民配置方案投票前一周，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在全国各地举行反移民游行。尽管媒体倾向于将这些反移民态度归因于种族主义或经济问题，但情况却

^① Piotr Majewski, “Polska dla Polaków, nie zaden kurwa Ahmed – analiza narracji islamofobicznych w polskim rapie”, *Kultura Popularna*, 2017, Vol. 3, No. 53, pp. 111 – 120.

^② Maciej Czarniecki and Agata Kondzińska, “Waszczykowski: Uchodźcy nie przyjada”, *Gazeta Wyborcza*, 25 listopada, 2015.

^③ Piotr Cap, “We don’t want any immigrants or terrorists here: The linguistic manufacturing of xenophobia in the post – 2015 Poland”, *Discourse & Society*, 2018, Vol. 29, No. 4, pp. 380 – 398.

^④ Bart Bachman, “Diminishing Solidarity: Polish Attitudes toward the European Migration and Refugee Crisis”,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diminishing-solidarity-polish-attitudes-toward-european-migration-and-refugee-crisis>, 访问时间：2021 年 7 月 10 日。

并非仅仅如此。这种仇外情绪最终汇聚成了反欧盟和反移民情绪大趋势的一部分^①。事实上，民众反移民情绪的急剧升温与右翼政府的激烈言辞及其主导的主流媒体舆论密不可分。2015年华沙大学偏见研究中心（CBU）的一项研究表明，由于恐惧感，穆斯林被视为波兰最不受欢迎的宗教团体。在接受调查的互联网用户中，有49%的人声称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超过50%的人认为穆斯林会威胁波兰的经济安全，约55%的人认为伊斯兰教对波兰的价值观构成威胁。大约66%的人宣称他们害怕与穆斯林接触^②。

波兰公共舆论研究中心（CBOS）2017年12月的调研报告显示，波兰人普遍反对接收难民，尤其是来自中东和非洲的难民。波兰国内对于来自以上两个地区难民的敌意程度达到了该中心开始监测以来的最高水平^③。即使欧盟针对波兰拒绝执行欧盟委员会推出的难民方案，表示将以削减拨给波兰的欧盟基金作为惩罚，四分之三的受访者仍然认为波兰不应该接受来自伊斯兰国家的难民。这种态度的变化是右翼言论影响的结果^④。右翼政府的难民叙事建构了一种霸权式的伊斯兰恐惧症话语：穆斯林威胁的想法已经成为一种集体的“常识”^⑤。

（二）波兰右翼政府坚决反对欧盟难民政策

2015年9月以来，为了缓解受难民危机影响最大的成员国，特别是希腊、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压力，欧盟委员会建议将明显需要国际保护的12万寻求庇护者进行重新安置。随之，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以下方案来应对当时的难民危机：委员会提议将申请前住意大利、希腊和匈牙利的12万需要国际保护的难民按照强制性分配机制进行重新安置。重新安置工作遵循可量化指标，其中一国的人口规模占比为40%，国内生产总值占比也是40%，过去难民申请庇护的平均数量和国内失业率各占10%。根据该项配额计划，12万难民中60%将被安置在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匈牙利等国，其他17国承担其余的40%。2015年9月22日召开

^① Bart Bachman, “Diminishing Solidarity: Polish Attitudes toward the European Migration and Refugee Crisis”,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diminishing-solidarity-polish-attitudes-toward-european-migration-and-refugee-crisis>,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0日。

^② Anna Stefaniak, “Postrzeżenie muzułmanów w Polsce: Raport z badania sondażowego”. <http://cbu.psychologia.pl/uploads/images/foto/Postrzeżenie-muzułmanów-w-Polsce.pdf>, 访问时间：2021年7月9日。

^③ CBOS, “Attitude to receiving refugees”. https://www.cbos.pl/PL/publikacje/public_opinion/2017/12_2017.pdf,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1日。

^④ Quote from Krzysztof Jaskułowski, *The Everyday Politics of Migration Crisis in Poland Between Nationalism, Fear and Empathy*,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2019, p. 119.

^⑤ Konrad Pedziwiatr, “Islamophobia in Poland: National Report 2016”, in Enes Bayraktar and Farid Hafez, *European Islamophobia Report 2016*, SETA, 2017, pp. 411-443.

的欧盟内务部长会议，以多数表决方式通过了 12 万难民的摊派协议。然而以波兰为首的维谢格拉德四国投了反对票^①。从上文所述的右翼政府对于本体安全叙事的建构中不难看出，宗教身份和主权身份成为其强化本体安全威胁感知，进而率领人民反抗欧盟难民救济政策的主要政治和社会资源。

首先，将穆斯林难民视为对基督教文明和民族身份的破坏的叙事建构，加剧了以波兰为首的宗教保守主义和以法德为首的西欧国家的宗教开放主义之间的对立程度。但对于波兰右翼政府而言，其成功之处在于利用穆斯林难民涌入这一问题，唤起了人们对于信仰威胁的深度担忧。因此，在难民危机发生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右翼政府统治下的波兰天主教会对待难民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即使是波兰的天主教开放派，也在右翼政府的叙事下不得不倒向反对难民救助的一方。他们一方面在公共场合表达了对难民所遭受痛苦的同情，表示必须根据基督教的仁慈原则对其提供救助。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又含蓄地流露出对于难民所带来的恐怖威胁的担忧。他们还表示，援助难民最适当的方式是对他们的来源国进行援助^②。

这一论调恰好为右翼政府反对欧盟委员会的难民安置方案提供了说辞。法律与公正党主席卡钦斯基在接受《法兰克福报》采访时表示，“让大量难民进入欧洲将导致一场对基督教文明的清算”^③。他还在 2017 年 5 月 26 日接受《波兰日报》采访时重申了对难民问题的立场，同时警告波兰一旦接受难民“将不得不彻底改变我们的文化，从根本上降低我们国家的安全水平”^④。时任波兰总理希德沃在 2016 年 9 月也明确表达了反对态度，她强调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波兰无法与来自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人群共存^⑤。

其次，由代表欧盟声音的官僚机构精英和作为相对弱势成员国的波兰政府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Refugee Crisis: European Commission takes decisive action”. https://ec.europa.eu/malta/news/refugee-crisis-european-commission-takes-decisive-action_en, 访问时间: 2021 年 11 月 9 日。

② Joanna Krotofil and Dominika Motak,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media coverage of the migration crisis in Poland – The Polish Catholic Church’s perception of the ‘migration crisis’”, *The Ethnic and Religious Future of Europe*, 2018, Vol. 28, p. 103.

③ Aleks Szczerbiak, “Why is Poland’s Law and Justice party still so popular?”. <https://blogs.lse.ac.uk/europpblog/2019/10/01/why-is-polands-law-and-justice-party-still-so-popular/>, 访问时间: 2021 年 6 月 9 日。

④ Jan Cienski, “Why Poland doesn’t want refugees”.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politics-nationalism-and-religion-explain-why-poland-doesnt-want-refugees/>, 访问时间: 2021 年 6 月 9 日。

⑤ Piotr Cap, “We don’t want any immigrants or terrorists here: The linguistic manufacturing of xenophobia in the post-2015 Poland”, *Discourse & Society*, 2018, Vol. 29, No. 4, p. 389.

(人民)对立程度的加剧,以及超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对立加剧所引发的主权身份危机成为波兰右翼政府反抗欧盟难民方案的又一个重要政治资源。右翼政府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主席卡钦斯基在波兰下议院论及民族利己主义原则时强调,“难民只是德国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在他看来,默克尔试图迫使其其他欧盟成员国分担德国对难民奉行多元开放政策所带来的恶果。此外,卡钦斯基在接受《法兰克福报》采访时强调,欧盟总体上是成功的,但其犯下的严重错误之一就是2007年《里斯本条约》扩大了欧盟在难民危机上的人道主义保护权。卡钦斯基还告诉法新社:“我们必须加强民族国家,减少联盟的管辖权。”^①正如时任波兰外交部长维托尔德·瓦什奇科夫斯基在2016年1月外交政策信息报告中所强调的,“波兰外交政策植根于主权国家的政治意愿”^②。波兰政府坚决反对欧委会新的难民配置提案^③,这个提案将迫使欧盟成员国为每个被拒绝的难民支付25万欧元。这样的决定也将侵蚀欧盟成员国的主权^④。随后,2017年5月16日,在华沙就难民接收问题召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时任波兰总理希德沃再次重申了波兰的立场,称:“波兰拒绝在欧盟难民安置框架内接收难民,并再次强调波兰与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其他三国均将不会因为欧盟的压力与要挟而对其妥协。”^⑤在2018年6月底之前,波兰对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强制性难民配额方案仍然持否定态度。波兰认为,欧盟委员会关于建立一个固定的难民分配制度的建议是不能接受的。根据现行规定,寻求庇护者抵达的第一个欧盟国家需要处理该人的申请。而改革之后的欧盟庇护政策引入了难民分配的固定机制,用于危机情况处理。因此,波兰强烈反对这一提议^⑥。

另一个显著证据是法律与公正党上台前后的两届政府对难民态度的立场变

^① Deutsche Welle, “Poland’s influential PiS party leader Jaroslaw Kaczynski calls for EU reform”. <https://www.dw.com/en/polands-influential-pis-party-leader-jaroslaw-kaczynski-calls-for-eu-reform/a-37435599>, 访问时间:2021年6月9日。

^② Rzeczpospolita, “Pełna treść expose Witolda Waszczykowskiego”. <https://www.rp.pl/Rzad-PiS/160129236-Pelna-trecz-expose-Witolda-Waszczykowskiego.html>, 访问时间:2021年6月9日。

^③ 鉴于部分成员国对欧盟委员会的难民安置方案持反对态度,欧盟委员会向那些不愿意接受难民的国家提出新的要求,即反对接收移民的国家要为拒绝的每个难民支付25万欧元,这笔钱将归于对有关移民负责的国家。欧盟方面认为,此举体现了欧盟内部的团结原则,而不是一种惩罚。

^④ “Polska zapłaci za każdego nieprzyjętego uchodźcę? KE przedstawia plan reformy polityki azylowej”, <https://forsal.pl/artykuly/940960,ke-reforma-polityki-azylowej-kary-za-nieprzyjmowanie-uchodzcow-automatyczna-dystrybucja.html>, 访问时间:2021年6月9日。

^⑤ 《波兰总理:波兰政府不同意接收难民》, <http://sputniknews.cn/politics/201705171022646955/>, 访问时间:2021年8月7日。

^⑥ Polish foreign minister, “EC’s refugee proposal unacceptable”. <http://www.pap.pl/en/news/news,520485,ecs-refugee-proposal-unacceptable--polish-foreign-minister.html>, 访问时间:2022年10月6日。

化。2015~2017 年间，由埃娃·科帕奇（公民纲领党，2014~2015，持融欧主义立场）和贝亚塔·希德沃（法律与公正党，2015~2017，持疑欧主义立场）领导的两届波兰政府就如何解决移民危机提出了立场。两个政府都主张更好地保护申根区的边界，并对难民原籍国提供援助，反对欧盟将难民配额强加给各个国家。但两者的不同在于，科帕奇政府经过一番犹豫，在背离维谢格拉德集团其他成员国政策的情形下，最终加入了欧盟难民援助计划。科帕奇强调说，波兰将只接受来自中东和北非的难民，而不接受经济移民^①。与此相悖的是，在希德沃政府执政的最初几个月中，他们没有质疑前任政府接受的难民配额。但在 2016 年 3 月 22 日布鲁塞尔遭受恐怖袭击之后，希德沃政府宣布退出科帕奇政府此前作出的在两年内接纳 7 000 名难民，并反对任何其他配额制度的承诺。希德沃还强调，这一决定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也是出于在波兰社会反穆斯林情绪日渐高涨的背景下捍卫民族认同愿望的考虑。而刚刚被该党提名的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雅罗斯瓦夫·戈文（Jaroslaw Gowin）认为，穆斯林难民“会大大增加恐怖袭击的威胁”。另一位波兰社会党政治家在众议院辩称，“这些所谓的难民中有 75% 是来欧洲进行‘圣战’的壮汉”^②。

四 波兰疑欧主义的影响

2015 年欧洲难民危机的爆发为右翼政党（法律与公正党）引导公共舆论、煽动排外主义情绪、赢得选举创造了一个有利时机。右翼政府对于欧盟难民安置计划的坚决反对和严厉谴责引发了来自西欧的欧盟成员国的强烈批评，这与主张和德法密切合作的融欧主义政党——公民纲领党的政策倾向形成鲜明对比，一时间引发波兰与欧盟围绕主权、安全、身份认同等叙事的冲突。与此同时，右翼政府在移民危机中推行的疑欧主义政策立场，反过来也加剧了波兰社会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和排外主义思潮，尤其表现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这一趋向直接导致波兰社会朝着更趋保守化的方向发展，反过来也进一步稳固了右翼政府的统

^① Stolarczyk Mieczysław, “Stanowisko Polski wobec kryzysu migracyjno – uchodźczego Unii Europejskiej”, *Krakowskie Studia Międzynarodowe*, 2017, Vol. 14, No. 2, p. 31.

^② “Sprawozdanie stenograficzne z 100. posiedzenia Sejmu Rzeczypospolitej Polskiej w dniu 16 września 2015”. http://orka2.sejm.gov.pl/StenoInter7.nsf/0/A8CA0F4060DE3B1CC1257EC200722812/%2524File/100_a_ksiazka.pdf, 访问时间：2021 年 7 月 11 日。

治合法性和执政根基。下文将主要从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对波兰疑欧主义带来的影响进行评估。

从对内层面来看，右翼的疑欧主义政策是以煽动国内社会的排外主义情绪为代价的，这一情绪又壮大了国内的经济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最终导致国内以法律与公正党为代表的保守派和以公民纲领党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保守派之间对立的扩大化。以上两个派别代表了波兰社会的两种主流趋势，而这种对立趋势长此下去将可能撕裂波兰社会，导致波兰社会陷入两极化的分裂状态。围绕 LGBT 问题的争论是一个典型例证。法律与公正党声称信奉“传统价值”，对堕胎、同性恋、家暴等议题特别反感，宣称 LGBT 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来自法律与公正党的总统候选人杜达 2020 年在竞选总统时也宣誓要“推动摆脱 LGBT 意识形态”。该言论在波兰引发争议，批评者认为杜达不应将同性恋问题视作一种意识形态。然而，波兰当局在反对 LGBT 议题上走得较远，诸多自治地方竞相宣布为“零 LGBT 区”，到 2020 年 6 月已达 100 个之多。这些做法引发欧盟的批评和惩罚。2019 年 12 月，欧洲议会宣布对宣布为“零 LGBT 区”的地方政府进行了谴责。2020 年 7 月，欧盟以违反《欧洲人权公约》为由停止向这些地方政府提供欧盟凝聚力基金。2020 年 10 月，反对新任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普热梅斯瓦夫·查尔奈克（Przemysław Czarnek）的游行示威在华沙举行，理由是查尔奈克坚定反对 LGBT。而在稍早前的 9 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专门批评了波兰，强调法律与公正党的反 LGBT 政策违背欧盟理念。

从对外层面来看，波兰在难民危机上表现出来的疑欧、反欧立场彻底破坏了过去八年两届政府通过与德法密切合作而在欧盟内部树立起来的良好信用和融欧形象。右翼政府的疑欧主义意识形态深刻地折射出波兰坚持的主权优先原则与欧盟的超国家权威之间的二元张力。这种张力已经成为横在欧盟老牌成员国与波兰之间无法消解的矛盾。按照德国和法国等西欧大国的主观意愿，欧盟未来的发展目标是不断提高一体化水平，尤其在政治共同体的合作领域。欧盟是以法德合作为轴心，基于主权让渡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未来将朝着高度的政治共同体目标迈进，一个可能性路径是从一个松散的“邦联制”形式逐步迈向“联邦制”统一体。欧洲一体化目标一直得到德法等国的积极主导与推动。但波兰作为中东欧国家，在历史上饱经主权沦丧之苦，因此对国家主权独立这一

原则性问题格外敏感^①。事实上，波兰所期待的是：欧盟继续维持单一市场内人员、货物、资本和服务的自由流动，恪守自由和平等，坚持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并在以上基础上遵循团结原则和辅助原则，保证每个国家保留其主体性和符合国家利益的发展模式。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1）多中心的欧盟，避免“中心—边缘”格局的形成；（2）平等的欧盟，避免成员国之间的等级制；（3）一个放松管制的联盟，而不是连续的制裁、禁令和命令；（4）团结的联盟，避免多速欧洲的不均衡格局；（5）民主的联盟，尊重民族国家决策和发展的主体性；（6）一个开放的联盟，总是为新国家的加入留下可能性^②。

此外，自 2015 年起，法律与公正党在波兰发起的司法改革与欧盟宪法相抵触，从而遭到了欧盟的法律诉讼与制裁，双方就此陷入长期争执之中。该党甚至将欧盟对波兰司法改革的介入指责为粗暴干涉波兰内政的行为。以上纷争导致波兰在欧盟内部日益孤立，与其现实的国家利益导向相悖。2021 年 10 月 7 日，波兰宪法法院裁定，欧盟法院拥有解释欧盟法律规范的专属管辖权，而宪法法院对宪法标准有最终决定权，包括法官的任命和他们的任期。这一裁决对欧盟法律的优先地位和欧盟法院的权威性构成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正如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约瑟普·博雷利（Josep Borrell）所强调的，欧盟法律高于国家立法是欧盟的支柱之一^③。就其本质而言，波兰右翼政府与欧盟之间的法治争端的根源在于双方的本体安全观念之争。

可以预见的是，在右翼政党执政期间，波兰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疑欧主义立场不会有明显转变。相反，随着波兰与欧盟在难民危机、统一的能源政策以及司法改革等诸多议题上分歧的不断扩大和增多，波欧关系可能更趋紧张。而波欧关系分歧的不断积累也会大幅度削弱和破坏双方的利益共识，进一步扩大波兰右翼政府的疑欧主义声势。

^① BBC, “The clash of the euro visions”.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42868599>, 访问时间：2022 年 7 月 6 日。

^② “Program Prawa i Sprawiedliwosci 2014”. <http://pis.org.pl/dokumenty?page=2>, 访问时间：2021 年 6 月 9 日。

^③ Agnieszka Matłacz, “TK: Prawo traktatywne Unii Europejskiej jest sprzeczne z Konstytucja RP”. <https://www.prawo.pl/prawnicy-sady/wyzsosc-prawa-unijnego-nad-krajowym-w-tk>, 510780.html, 访问时间：2022 年 8 月 9 日。

结 语

保守的民族主义思想、二战之后形成的单一种族结构，以及天主教国家的宗教属性和经济转型以来的社会阶层分化等因素，共同构成了波兰当前社会和文化的底色。这种底色催生了“基督教民主主义、民粹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等相互交织又各自独立发挥作用的意识形态，进而建构了波兰右翼政府的“本体安全观”。本体安全感越强，波兰的疑欧主义信念越弱；相反，本体安全感越弱，波兰的疑欧主义信念越强，进而对欧盟的政策抵制力度越大。

右翼政府的疑欧主义叙事建立在缺乏足够本体安全感的基础上，即处在本体不安全的状态之中。通过分析波兰右翼政府有关难民带来的恐怖主义威胁这一叙事，可以发现，这种本体不安全感更多是一种想象中的、带有政治目的的有意识的建构，是对区别于他者的本我身份遭受侵蚀甚至是吞噬的焦虑和担忧感。遵循这一逻辑，右翼政府怀有的本体不安全感就像一个处在休眠期的火山，随时有可能被重新唤醒和喷发。2015年声势浩大的欧洲难民危机恰好成为诱发因素，不仅唤醒和激发了波兰和欧盟之间潜藏已久的固有矛盾，而且引发了一场欧盟老牌成员国与2004年以来相继入盟的中东欧新成员国之间的本体安全之争。虽然对在经济、政治或文化维度都处在相对弱势地位的中东欧国家而言，其入盟进程必然将伴随着不可避免的不适乃至阵痛。但主权遭到削弱、身份认同遭受侵蚀以及民族文化遭受冲击等因素引发的本体不安全感，正在触发以波兰为代表的新成员国对欧盟在经济、文化以及主权叙事上的反叛和抵制。如果波兰右翼政府将挑战欧盟权威作为增强国内凝聚力的政治工具，那么可以想象的是，此举可能引发区域内其他国家的效仿，长此以往势必将欧盟拖入合法性危机，即欧盟存在的法理根基将遭到严重侵蚀，一体化进程也将面临不可逆的负面冲击。

作为一篇个案研究型文章，本文旨在解释波兰为何成为中东欧疑欧主义最强烈的国家。为了进一步揭示波兰在中东欧疑欧主义国家中所显示出的异质性，笔者试图从历史和宗教两个维度上作出进一步阐释，亦作为本文研究的一个问题延伸。从宗教因素来看，在社会保守化趋向上最为强烈的波兰，同时也是基督教根基最深、信教群众最广泛的欧盟国家之一。波兰在1966年就皈依了基督教。据2019年9月欧洲晴雨表调查数据，2019年波兰天主教教徒占比则超过马耳他，

位居欧盟第一位^①。2015 年以来，在宗教世俗化加速的背景下波兰国内天主教信徒占比的相对攀升，侧面佐证了右翼政府的社会保守化趋向，与此同时，这种趋向反过来也进一步稳固甚至扩大了法律与公正党的群众基础。

从历史因素来看，波兰在历史上不论从领土面积还是政治影响力来看都曾一度是欧洲大国，这些历史记忆在两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疑欧政党的世界观里依然闪耀。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元帅毕苏斯基提出以波兰为中心建立联结中东欧国家的海间联盟，到 2015 年波兰法律与公正党政府提出的三海倡议，无不流露出当前波兰民族“小国的大国抱负”这一民族心态。作为帝国附庸与屡受压迫的历史是中东欧所有国家的共同记忆，这种记忆天然地使中东欧对大国心怀警惕。不过，由于地缘毗邻性差异，中东欧国家基于创伤记忆的恐惧来源对象并不一致。例如，爱沙尼亚、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等国的民族意识里存在着“恐德症”记忆^②。这种创伤记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会对它们的“德国观”产生影响。而波兰的“恐德症”在所有中东欧国家中最为严重。一个显著证据是，2022 年 9 月 1 日，波兰右翼政府发布了一份名为《关于 1939 ~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因德国侵略和占领而遭受损失的报告》，该报告的撰写历时五年（2017 ~ 2022），参与者包括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档案管理者、律师等 33 名涉及相应知识领域的专家。报告估算，德国应赔偿波兰 1.3 万亿欧元的战争损失。这份报告一经发布便在波兰国内以及波德之间引发了广泛的叙事辩论。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何以在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及二战纪念日来临之际提上波兰右翼政府的政治议程，除经济补偿的本身意义之外，安全和政治层面的弦外之音或是其根本目标。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波德矛盾背后折射的是欧洲的记忆裂痕。

（责任编辑 聂保诚）

^① 2015 年欧洲晴雨表数据显示，马耳他天主教信徒占比为 95%，位居欧盟首位；波兰天主教信徒占比为 90.7%，位居第二位；而在 2019 年欧洲晴雨表调查数据中，马耳他下降到了 83%，波兰天主教信徒占比也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不大，以 86% 的占比取代马耳他成为欧盟成员国中天主教信仰占比最高的国家。

^② 1941 ~ 1943 年间，纳粹德国在对苏联发起的巴巴罗萨行动中顺势占领了波罗的海三国，并在占领期间发起了一系列种族歧视、强制迁徙，甚至包括屠杀行动，引发了当地民众的抵抗运动。对波兰而言，与德国之间的历史记忆更为沉重，不论是三次瓜分波兰还是 1939 年的闪击波兰行动，都在波兰民族史上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参见：Mojca Šorn, “Life in Occupied Slovenia During World War II”, in Jurij Perovšek and Bojan Godeša eds., *Between the House of Habsburg and Tito: A Look at the Slovenian Past 1861 – 1980*, Ljubljana, 2016.